

歷史故事記誦的啟蒙探析——以《龍文鞭影》為例

林美惠¹

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所博士生

摘要

《龍文鞭影》是部集結歷史人物事蹟的蒙書，而其內容蘊含的典故涵蓋有經、史、子、集四部之書，故事更有自然、歷史、倫理、社會等多元題材。由於該書內容龐雜，造成親和力的減弱(難以全書記誦)，加上時代的進化，故將內容進行篩選。本研究將對本書作一故事題材分析，即本書的故事意涵經由孩童聆聽吸收後，將書本中的經典字句，形成個體的基模，此等內部(記憶)語言的基模，將於個體青少年或成長後，逐漸型塑出環境適應的社會性格和解決問題的學習技巧。本書經孩童再三口誦心維之際，將由知識的開端進而架構文化觀，也由道德的認知進而培養倫理觀。孩童閱讀本書的過程，就是藉由古人的智慧，提供將來對文化認識、思維模式及行事準則的參考，更是陶冶品性、型塑人格與增廣知識的教材，正是透過本研究的論述，重新定位傳統蒙書的現代價值。

關鍵字：蒙書、典故、道德認知、基模

Discuss the Enlightenment from Reciting History Narrative — Take“Long Wen Bian Ying ” As an Example

Mei-Hui Lin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Long Wen Bian Ying*” is a textbook for ignorant people during the Wan-Li emperor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textbook is used to promote the children’s literacy ability and poetry composition. The constituent structure of the textbook is four words to form a sentence, and two sentences to form a couplet which is a formation in rhyme. The allusion collects historical notables monuments which is included The Four Books. The subject-matter area is multiple with science(difficult to recite), history,

¹通訊作者：林美惠（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所博士生） 地址：台中市豐原區西安街 187 號 Tel：(04)25295569 E-mail：a50may@yahoo.com.tw。

ethics, and social study, etc. The content is multifarious and disorderly that it is not friendly enough for the readers. Moreover, it is becaus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era that the researcher sifts out the suitable content of the textbook.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subject matters of the textbook. It briefly divided the story category into two fields – Knowledge Enlightenment and Ethics Cognition. The researcher examines the story enlightenment through the aspect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It means that students listen to the story, absorb the implication of the story, then make those words and expression become their schema. This kind of inner language schema will gradually evolve into the social personality of adapting environment and the learning skills of problem solving.

Key Words : knowledge enlightenment allusion ethics cognition schema

一、前言

每人在兒童時期的閱讀經驗當中，或多或少都接觸過《格林童話》中灰姑娘或小紅帽等等，《安徒生童話》中醜小鴨、小美人魚或國王的新衣等等，《伊索寓言》中龜兔賽跑、狼來了或北風太陽等等，也有念過如《三字經》、《千字文》或者《千家詩》等等。

當歷經歲月之後，童話內字詞或許已全然忘光，但童話情節清晰，而且童話寓意也能心領神會；反觀傳統啟蒙書中「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 · · · · .」，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 · · · · .」，「春眠不覺曉· · · · · .」、「白日依山盡· · · · · .」等等或許能隨口成誦，且內中典故成辭或為文章遣詞用字的資材。

《龍文鞭影》是部集結歷史人物故事(如童話一則則的故事)的蒙書，故事題材對兒童啟蒙的價值在於永無止境的語文能力培養(如「布重一諾」的一諾千金或千金一諾)。愛聽故事不僅是兒童的天性，更能滿足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激發模仿學習的向善心。此即為傳統「蒙以養正」教育功能所在，也是影響倫常維繫的價值關鍵。

蒙書教育²的宗旨既以「蒙以養正」為中心思想，教材的內容當以道德教育為主。但是道德教育的「形而上」內容若超出兒童的理解程度，因而無法落實於實踐時，則容易流於空談。本文先就蒙書的淵源(遠溯

² 九0年代以來，大陸方面有徐梓編輯《蒙學輯要》、喬桑主編《蒙學全書》及張志公所撰《傳統語文教

漢代)與功能分類,了解蒙學源遠流長的理路進程,與現代古典閱讀的根本差異。再藉由古代蒙書的種類可分成「字書」、「格言」、「蒙求」等三種類型,而前兩者或有學習事倍功半之累,或有學習徒勞無功之憾;但後者不僅符合兒童愛聽故事的天性,還能激發向善的仿效之心,達到不言而化的蒙養歷程。所以蒙求體歷史故事的記誦蒙書傳承數量頗多,其中《龍文鞭影》不僅直接繼承了《蒙求》,還在故事內容更加擴充,甚至與《幼學瓊林》具有相同的地位。

最後藉由《龍文鞭影》³故事分析的認識,體認本書現代閱讀的功能性意涵,意謂歷史故事的語文演繹,架構人文通識的義理思維,典故傳承的辭章應用。並且結合兒童閱讀經典活動的推廣,讓誦讀傳統蒙學讀物,不再被視為是落伍觀念,更能鼓動風潮,配合林立的閱讀經典據點⁴,則古代鄉塾琅琅書聲似可再現。

二、蒙學的淵源觀

《中庸》三綱領、《大學》八條目雖強調道德實踐的倫理,但《論語》所揭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重視知識基礎的價值,而蒙學的「蒙以養正」⁵特質所體現就是倫理踐實的知識。蒙學的意義有二種解釋,其一即是指古代的小學教育,是兒童教育的一環,另有解釋是專指歷代產生和流傳的的啟蒙讀物。因為兩者對「學」思考有所不同,前者是強調理念思想,後者則是專指啟蒙讀物⁶。

蒙學強調當兒童智慧(記憶力)萌發之際,應該及時施以教育啟迪心智,使兒童思想語文得以健全發展。蒙學宗旨既以「蒙以養正」為中心思想,蒙學教材的內容當以道德教育為主。但是道德教育的「形而上」內容,若是超出兒童能理解的程度,則無法落實於實踐,就容易流於空談。

育初探》等等,台灣部分有林文寶《歷代啟蒙教材初探》、李國鈞《明清蒙學教育述評》及陳宏謀《養正俗訓遺規》等等專書。在碩論方面有王寶彩《明代道德教養類蒙書之研究》、張心愷《明清時代蒙學施教所啟導之文化典範與應世智能》、宋健行《我國傳統啟蒙教材研究—以台灣地區為觀察重心》及陳進德《明清啟蒙教材研究》等等研究,在期刊部分有林翠鳳〈中國傳統蒙書敘說〉及梁敏兒〈從三、百、千看中國的蒙學〉(皆刊登於《國文天地》)等等。

³在碩士論文方面大陸有陳鑫《中國古典蒙學教材《龍文鞭影》研究》及黃慧紅《現代語文教育視野下的《龍文鞭影》探析》等等,台灣部分有蘇美珠《厚積薄發聘神思—《龍文鞭影》研究》及游茜婷《明清蒙學教材《龍文鞭影》的教育價值與教學應用》等等。在期刊部分有丁淑萍〈明代啟蒙教材分析—以《龍文鞭影》為例〉及張清榮〈《龍文鞭影》之兒童文學價值探析〉(臺南師院學報)等等。

⁴當前推動讀經活動除王財貴的華山書院讀經推廣中心,尚有一貫道寶光建德兒童讀經班,福智文教基金會親子讀經班等等宗教或公益團體,或其他托兒所、幼稚園自辦的讀經活動。

⁵「蒙」當源於《易經·蒙卦》之〈卦辭〉:「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彖辭〉:「蒙以養正,聖功也。」馬叔禮:《易經》,新竹:策馬入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頁12。

⁶本文所涉蒙學者以教育理念為主,若指啟蒙讀物則以蒙學教材或蒙書稱之。

蒙學的起源是依據《漢書·藝文志》所錄「小學」類的史料所載，其歸類於《孝經》之後，屬於「六藝為九種」⁷之末序，但列在子部之前，是強調「小學」學習的重要地位，並作為六藝教育的入門基礎。這顯示蒙學教材所具官方編訂的色彩，所以歷代正史的藝文志或經籍志中所載的蒙學教材，也就代表歷代官方對蒙學教育理念的實際內容。

《漢書》所載「小學」類史料，可視為是周、秦或漢代官方審定識字程度的標準規範，並作為政府選拔官員人才的評選參考。以漢代為例，對於其中表現優秀者，分任尚書、御史、史書、令史等職⁸，代表識字教育的目的不是「蒙以養正」，僅是作為出仕應試的憑藉。此現象雖是歷史發展的知識局限因素，也彰顯出蒙學功能中的功利主義不容忽視的一面。

在識字教育的蒙書當中，以能脫六書識字的《三蒼》最為稱道，其書為「以《蒼頡》為上卷，揚雄之《訓纂》為中卷，賈鮪之《滂熹》為下卷，稱為三蒼，屬漢代國民教育的認字教材。」⁹內容依物分類中「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學童蒙，或取作日常章奏起草赴急之用。」¹⁰後有《開蒙要訓》（六朝馬氏）最具蒙書特性的代表，此書在史志未見著錄，卻是廣為民間私塾所採用。就如林文寶所論：「雖然歷代的藝文志、經籍志，或是私家的書目著作，或多或少都收錄有啟蒙的教材。但是我們卻發現這些登堂入室的書目只是見存而已，或許有幸收錄於「四庫全書」裡，事實上並不為民間私塾所採用的。而民間所採用的，除有「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外，皆作者不詳。由此可知，登堂入室的啟蒙書目，是代表著知識份子的一種教育理想。事實上這種理想的教材，一直未能在民間流行。」¹¹從歷代的藝文志、經籍志所集蒙學教材，並不為民間私塾所採用的，而民間所採用如《千家詩》、《玉堂對類》、《幼學瓊林》、《昔時賢文》、《童子問路》、《起講八法》、《十歲能文》等等¹²。顯示歷代蒙學並無官設

⁷ [漢]班固：《漢書》，臺北：宏業書局有限公司（1984），頁438。（六藝九種依序為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等。）

⁸ 依《漢書·藝文志》所載：「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著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並收錄「小」類史料《史籀》十五篇、《蒼頡》一篇、《急就》一篇、《訓纂》一篇、《揚雄蒼頡訓纂》一篇等等凡十家四十五篇。同上注，頁437-8。

⁹ 林文寶（1997）：《歷代啟蒙教材初探》，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頁19。

¹⁰ 蘇尚耀（1976）：《中國文字學叢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頁42。

¹¹ 同注9，頁242。

¹² [日]東方孝義（1998）：《台灣習俗》，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頁106-7。

單位，而且蒙學的教育者（塾師）的理念已超越「小學」規範。前者表示蒙學的場所在家庭或村里的私塾，即來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的傳統；而後者強調自隋唐以後，蒙學不再以「蒙以養正」為最高指導原則，科舉入仕的功名利祿才是訓練價值所在。

余嘉錫在〈內閣大庫本碎金跋〉將古代蒙書的種類分為「字書」、「蒙求」、「格言」等三種類型：「《三蒼》既亡，《急就》亦不行，然在學校未興以前，村塾小兒所讀之書，及古之小學，未嘗絕也。析而言之，可分三派。一曰字書，其源出於周興嗣，積字成篇，篇無複字，初學籀誦其文詞，臨摹其形體。其後有《百家姓》、《雜字》之類，此《三蒼》、《急就》之嫡嗣，小學之正宗也。二曰蒙求，其源出於李翰，屬對類事，編成音韻，易於諷誦，不出卷而知天下。其後有《三字經》及《幼學瓊林》、《龍文鞭影》之類，此《三蒼》、《急就》之別子，小學之支流餘裔也。三曰格言，其源出於《太公家教》，廣陳法戒，雜以俗語，使童蒙於次養正，淺視試為著蔡。其後有《神童書》、《女兒經》、《增廣》之類，此則因《三蒼》、《急就》之體推而廣之，於古者幼童讀《孝經》之意彌近，小學之濫觴也。蓋自唐、宋以來，幼童之所諷誦，不出三者。蓋自唐宋以來，幼童之所諷誦，不出三者。」¹³分別代表蒙學識字教育、歷史教育及道德教育的教材內容分類。雖然兒童心智啟迪須賴文詞字句的認識，因而啟蒙讀物內容當以識字釋物教育為先；但在識字釋物的學習過程難免單調枯燥，就學習效率而言有事倍功半之累。且道德教育的蒙書教材又易流於空言，就學習效果而言有徒勞無功之憾。而歷史教育的蒙書教材不僅符合兒童愛聽故事的天性，還能激發向善的仿效之心，就如名人傳記故事的效應，達到潛移默化之功，更兼具語文知識及待人處事的培養。唐代李翰（?—?)的《蒙求》是歷史類蒙書具有最高的典範性代表作品，依是書集註本云：「取古人言行美惡，類四句韻語，凡五百九十六句，皆以對偶成文，又自注出處於下，簡而不遺，以便童蒙。」¹⁴其據以衍生「蒙求體」的傳承蒙書數量最多、影響最為深遠¹⁵，「蒙求」儼然成為蒙書的同義詞。《蒙求》全書以歷史人物（至南北朝間）為對象，對句用四言（上二字為人名、下二字為行止），串聯以音韻，特別具有蒙書易誦易記的表現型式。

¹³ 余嘉錫（1976）：《余嘉錫論學雜著》，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頁 605-6。

¹⁴ 鄧嗣禹（1970）：《中國類書目錄初稿》，台北：古亭書局，頁 115。

¹⁵ 如《續蒙求》、《廣蒙書》、《系蒙求》、《六言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歷代蒙求》、《十七史蒙求》、《西漢蒙求》、《漢臣蒙求》、《純正蒙求》等等。

南宋時期陳振孫(1179—1262)的《直齋書錄解題》又云：「唐李瀚《蒙求》三卷，本無義例，信手肆意，雜襲成章，取其韻語易於訓誦而已，遂至舉世誦之，以為小學發蒙之首。」¹⁶書中綴連歷史故實而成，全篇協韻工整，所以「自中唐至于北宋，是書為童蒙課本，最為通行。」¹⁷餘風所及，更影響《龍文鞭影》的問世，其書可視為《蒙求》的翻版。明代蕭良有(?—?)及楊臣誨(?—?)的《龍文鞭影》(《蒙養故事》)可視《蒙求》的改良版，在內容上擴充不少¹⁸ (詳後述)。

三、《龍文鞭影》的功能觀

《龍文鞭影》¹⁹全書兩集，每集兩卷；初集題：「明中楚蕭良有漢沖纂輯，龍眠楊臣誨古度增訂，古越來集之元成音註」，二集題：「番禺李暉吉子良，徐澹蘭哇輯」²⁰。本書原名《蒙養故事》²¹可視《蒙求》的擴充版，從書名與內容皆完全承繼。蒙養者蒙以養正，蒙求者童蒙求我，同源《易經·蒙卦》理念；內容以韻隸事者，是用韻統字，用字繫事；事者故事，亦即歷史典故。

明代蕭良有依《明分省人物考》²²所述，為庚辰（萬曆八年）會試一名，一甲二名（榜眼），以國子監祭酒致仕，著有《玉堂遺稿》(《四庫總目》)。楊臣誨與顧炎武、王夫之、朱之瑜、顏元、傅山、李顥等人時代相當，「世稱皖桐遺老，著有《禹貢箋》、《禮經會元》，亦當為頗具學識之士，惜其著作不傳。」²³來集之依《中國文學家大辭典》²⁴生平簡介，為蕭山人，是位崇禎十三年進士，精於易，尤工曲，著有《倘湖樵書》、《博學彙書》等等，並傳於世。另二集所題李暉吉及徐澹生平無可考。

¹⁶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台北：廣文書局（1979），頁 884。

¹⁷ 王重民（1978）：《敦煌古籍敘錄》，台北：成文書局，頁 207。

¹⁸ 《蒙求》全書總計 596 句，《龍文鞭影》則有 2056 句(全書 2068 句)敘述人物事蹟典故。

¹⁹ 從「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http://www.ncl.edu.tw/ncll.htm>〉的「圖書聯合目錄」中，可查知國內各大圖書藏書中有《龍文鞭影》出版品有 14 種內含大陸出版者。此 14 種《龍文鞭影》出版品中，台灣本地之出版品只有 3 種，其餘皆屬大陸出版品。此三種是德志、弘道和綜合三家出版社所出版(綜合

本為「繪圖精校本」分繪圖、標題、注解欄，弘道本及德志本兩者為「普通本」分詩韻、標題、注解欄)。另有網路版本編列於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ctext.org/wiki〉電子書體系之中，雖符合現代方便閱讀習慣，但典故出處尚未全本註明，僅編列初集一東韻至十灰韻。還有台灣華文電子書庫(Taiwan ebook.ncl.edu.tw)以全影複製，僅拷貝台灣大學藏書之龍文鞭影初集上卷，二集下卷(編排不分韻部，與常見本不同)，難窺全貌，內容編排與綜合本相同。本文證引條目以與《蒙求》重覆者優先選用，並採用民國 56 年由台北德志出版社初版印刷《龍文鞭影》作為分析引用依據。

²⁰ [明]蕭良有纂輯、楊臣誨增訂：《龍文鞭影》，台北：綜合出版社（1975），頁 1，149。

²¹ [明]蕭良有纂輯、李祚唐校點：《龍文鞭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1。

²² [明]過庭訓纂集：《明分省人物考》，臺北：明文書局（1992），頁 137。

²³ 同注 21。

²⁴ 譚正璧（1978）：《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頁 1281。

本書原作由國子監祭酒蕭良有《蒙養故事》修訂，原立意是以朝廷之力，宣揚「洪武正韻」如《永樂大典》故事，藉由《蒙求》體例，統一音韻，嘉惠蒙童。然音韻纂輯或有不足，故特標有來集之的音註，借重其曲律專才。而楊臣諍之所增訂，即欲扭轉性理的空虛學風，強調歷史故事對學童的養正之功，並把書名改為《龍文鞭影》，自注「龍文，良馬也，見鞭影則疾馳，不俟驅策而後騰驤也。」²⁵表示學童除四書五經的研讀外，通過本書即能快速掌握子學、史學的知識概念（如《龍文鞭影》首兩對：「羸成四字，誨爾童蒙；經書暇日，子史須通」所云）。

《龍文鞭影》四字一句、兩句一對按平水韻編排整齊的句式，初集二集皆自一東韻至十五咸韻，按韻次字、用字繁事，全書共計 2068 句，扣除「羸成四字，誨爾童蒙；經書暇日，子史須通」、「古人萬億，不盡茲函」，「篇承古度，集續漢沖；搜羅子史，誘掖兒童」、「俟編仄韻，再續斯函」等 12 句，本書有 2056 句的人物典故。用以協助習對作文的訓練，達到用事取韻的嫻熟。

（一）、典故傳布

《龍文鞭影》全書匯集古代流傳至明代，且為日常所沿用的成語典故，內容不僅代表文化情感的傳統延續，也濃縮歷史思想的片段記載，是為文字藝術之美的極致表現。

若就本書的語文價值論之，一言以蔽之就是一簡要。簡者即簡單，所以普遍而行之久遠；要者即要旨，所以會通而耐人尋味。在文字表現上成語典故是最具簡要的典範代表。

典故是語言文化意義上的「活化石」²⁶，一時之美文佳句故事，見載史籍經典乃至眾口傳誦襲用，便逐漸成為典故。其又為後人反覆借用反思，使得典故本身既有其核心文化意義，又有歷代傳統文化的傳承意涵，形成一種言語運用上的特殊技巧，更是文學創作常見的表現特色。

典故之意義，其不僅是為了論文立說的來源依據，更不僅止於文學美化的功能，它其實是「文化」的具體呈現，可考古，可證今。它，的確是語言文化的「活化石」。就如董志新在《典故的運用》所說：「典故，作為一種語言現象，一旦形成，其內容和形式都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不僅可持續幾年，幾十年，而且可以持續幾百年，幾千年。」²⁷

²⁵ 同注 20。

²⁶ 蔡妙真：〈永恆的經書與流動的價值—唐詩用《左傳》典故之觀察〉，台中：《興大中文學報》第十九期，頁 233。

²⁷ 董志新（1989）：《典故的運用》，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頁 136。

典故傳布最具體的形象，就是表現在「媽媽講故事」，家中的母親往往是孩子的第一位啟蒙老師，更肩負人格陶冶的教育。其中，宋代蘇軾的故事，最為人所樂道：當蘇軾的母親程氏教導蘇軾《後漢書·范滂傳》時，蘇軾問母親：「如果他成為范滂，母親將如何？」，程氏回答：「如果你成為范滂，難道我不能成為范滂的母親嗎？」²⁸。在《龍文鞭影》尚有「孟母斷機」、「歐母畫荻」、「陶母截髮」、「柳母和丸」、「母逐懷恩」、「母杖堯咨」、「廣披孟仁」、「韋文朱武」等，其間，當詠誦至此，良母形象就躍然而出。

其他，如「布重一諾，金慎三緘」的信、誠，「敝履東郭，粗服張融」的節儉，「壽昌尋母，董永賣身」、「衣蘆閔損，扇枕黃香」、「王祥求鯉」等孝行，「放歌漁者，鼓枻詩翁」的高潔，「趙抃攜鶴」、「李佳國士」、「聶憫田夫」的清廉，「溫公警枕」、「韓愈焚膏」、「任末燃蒿」的勤學等等，皆以具體德行表現德性操守。所以，性理道德不能空講，須藉由具體典範以形象化。就如清儒章學誠於《文史通義·浙東學術》所云：「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朱陸異同，……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²⁹雖然《龍文鞭影》之於學童僅是歷史故事，但是「蒙養」故事透過口誦心惟，期能產生潛移默化的行為指導。所以《龍文鞭影》在一集就開宗明義勉勵「經書暇日，子史須通」，在二集首四句循循善誘「篇成古度，集續漢沖，搜羅子史，誘掖兒童」。

（二）、先備知識

《幼學瓊林·文事》：「多才之士，才儲八斗；博學之儒，學富五車。（三墳五典，古聖之真傳；七緯九經，先民之祕要。）」³⁰，而《龍文鞭影》所引述的典籍，更包含經、史、子、集四部中，常用習見的字詞、成語典故等（經部有 31 句、史部有 1116 句、子部有 75 句、集部有 20 則）³¹。故為杜負翁所讚：「中華具有五千年歷史，分類典實浩如淵海，雖有《事物記原》、《淵鑑類函》等類書，記憶固弗可能，行旅亦難攜帶。為便蒙起見，乃有《幼學瓊林》、《龍文鞭影》諸書，簡單扼要，便於記憶。於是麗詞文藻，乃可一目

²⁸ 此故事引用自《宋史》蘇軾本傳中，故事原文可參閱〔元〕脫脫等撰，楊家駱校注：《新刊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列傳之九十七》，臺北：鼎文出版社（1991），頁 10801。

²⁹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7），頁 302。

³⁰ 〔明〕程登吉撰、馬自毅注譯：《新譯幼學瓊林》，台北：三民書局，1997，頁 301。
括號內文詞則取自葉玉麟注解《幼學瓊林》版本所示。

³¹ 蘇美珠（2004）：《厚積薄發聘神思－龍文鞭影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碩士論文），頁 46-9。

瞭然；屬草臨文，更可得心應手。嘉惠士林，豈為小補？」³²。所以，《龍文鞭影》所載內容，外在就是傳統語言的集合，內在就是認知概念的先備知識。

認知心理學對語言的認知發展功能的過程，就如前蘇聯心理學家和教育家維果茨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認為：「學前兒童的自我中心言語（egocentric speech）發展到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之後，自我中心言語即自行消失。此時，內部言語開始發展起來。……內部言語（inner speech，endophasy）是為個體自身的言語，似乎被理解為言語記憶。……內部言語轉化成內在思維。」³³（兒童的後天學習以記憶為基礎，記憶有短期及長期的分別。長期記憶的言語經由語意記憶便形成內部言語，此等內部言語的累積也就基模。另可參閱鄭麗玉（2020）：《認知心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八章。）

純就文字語言的外在表現觀點來講，詞是語言運用的最小結構單位，也是最小的修辭單位。但就認知發展的內涵意義的觀點來講，詞的意義代表了一種思維與語言的結合。此種思維與語言的結合構成「外部言語」，它是「為他人的言語。……是思維向言語的轉化，思維的具體化和客觀表現。」³⁴而《龍文鞭影》四字一句、兩句一對按韻編排的特性，學童經由誦讀、理解、記憶後，人物故事的形象最適於品格思維的具體化。

《龍文鞭影》在一集開頭所用典故便首推忠孝精神「重華大孝，武穆精忠」，次及古代前賢「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禱雨，漢祖歌風。秀巡河北，策據江東」，以緬懷先民開化墾土之功，再如「伏羲畫卦，宣父刪詩」、「蕭何定律，叔孫制禮」、「寅陳七策，光進五規」，等等開創文明進化之端。其他角色人物更有帝王如「太宗懷鶴」、「唐宗花萼」，政治家如「說相殷高」、「衛公切直，師德寬容」，軍事有「瑜燒赤壁」、「田單火牛」，外交有「相如完璧」、「漢史張騫」，文學家有「建安七子」、「能文曹植」、「晉室七賢」、「投閣揚雄」，史學家有「直筆董狐」、「公議袁樞」，藝術家有「滕王蛺蝶」、「摩詰芭蕉」，技藝有「扁鵲名醫」、「許淑陰功」、「蔡倫造紙」、「鄭國穿渠」等等。

（三）、記誦之學

³² 原文引自杜負翁（時年十七歲）為《龍文鞭影》所作之序文。見方師鐸（1971）：《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台中：台中私立東海大學，頁 273。

³³ 列夫·謝苗諾維奇·維果茨基著（李維譯）：《思維與語言》，台北：昭明出版社（2000）頁 201-203。

³⁴ 張德明（1995）：《語言風格學》，臺北：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145。

人際溝通交往常以制式語文來表達共通的思想感情，它須經一段約定俗成的過程。所以，約定俗成，它是人們公認的人類語言的最基本準則。而約定俗成的過程，就是傳統文化所影響的結果。文化共通語言（如警句、格言、成語典故等）也就是在言語之中，人總是趨向於用熟悉的、比較習慣的、具有較大普遍性的語言來進行交際。大量成語的起源、典故及意義，與中國的歷史文化之關聯故事題材，皆隱含很多歷史故事、名人傳記、文學雅事、諺語風俗等知識，為現今兒童奠定華語文閱讀的基礎學力、陶冶文學的鑑賞實力、培養品德素養的能力等等學習語文啟蒙基礎入門。

《龍文鞭影》文字簡練，音節鏗鏘，以成有韻字數、對仗工整之四字，便於學童記誦；用典取材廣泛，博采歷代典籍；釋文考證的詳盡準確，蘊含大量成語故事等等特色，非常適合精誦熟記。諸如「布重一諾，金慎三緘」、「二使入蜀，五老遊河」、「左思三賦，程頤四箴」、「五湖范蠡，三徑陶潛」、「沫經三敗，獲被七擒」、「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禰衡一鶚，路斯九龍」、「孔門十哲，殷室三仁」等等以數詞貫串學習。再或以單一人物集中學習，如孔子有「宣聖春風」、「宣父刪詩」、「啟期三樂」、「孔謬聞人」、「金慎三緘」等，韓愈有「韓愈闢佛」、「退之趨鱷」、「韓比雲龍」、「韓愈斗牛」、「韓愈焚膏」等。

甚或從「孔門十哲，殷室三仁」、「漢家三傑，晉室七賢」、「建安七子，大曆十人」、「八龍荀氏，五豸唐門」等等，由商周、楚漢、魏晉、唐宋等名士集團所開創時代風氣，明白個人、家庭(族)與國家的依存關係。就如連橫(1878—1936)在《台灣通史》所述從歷史可察知「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³⁵

此特色符合杜文〈功夫全從背誦來〉³⁶一篇所述：記誦做為語文學習的方法，其配合的步驟原則，應先選定具模範性的佳文，以長短適中、情韻靈動者為宜；再者，選取文章、體裁及題意相近；三者，經過訓詁求解、斷句分段研究。待其瞭然於胸，以收學習仿倣之功。亦如王陽明所論：「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³⁷

孩童們有喜愛「聽故事的天性，在鼓勵推廣兒童閱讀文化經典活動中，能配合其天性，由師長講述《龍文鞭影》中古代日常所襲用文字及成語典故；書中的寓言典故充滿智慧，優美風趣，尤富啟迪意義；其中大

³⁵ 《台灣通史·自序》，連橫撰，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95)頁9。

³⁶ 〈功夫全從背誦來〉，杜松柏撰，《國文天地》，32卷1期(1988)，頁48。

³⁷ 王陽明著（黎明文化編譯部）：《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6）頁113。

量格言警句，至今仍是廣為傳誦應用。用豐富的知識性故事內容，以吸引孩童的閱讀興趣。諸如「西山精衛」、「漁人鷸蚌」、「莊生蝴蝶，呂祖邯鄲」、「塞翁失馬」、「夸父追日」等等，信手拈來，俯拾皆是。

《龍文鞭影》的成書是在明末清初之際，成書的內容背負著不同的歷史時代背景，與不符現今價值觀念的封建思想。就如「傾城姐己」、「吳起殺妻」的女性歧視等等，「鬼贈珠袍」、「蜀女化蠶」的怪力亂神等等，「王察蟻言」、「鸚鵡誦經」的荒誕不經等等。所以，今日提倡鼓勵兒童閱讀經典讀物，應避免「學庸論孟隨口傳誦，師未知所教，弟未知所學」之失。

《龍文鞭影》能透過師長講述故事解說意涵，除讓學童能深刻了解古代文化和社會的演進；或可跳脫《龍文鞭影》以韻隸事的拘限，代之以字繫事(如數詞德行等等)或以類繫事(如人物時代角色等等)，再能去蕪存菁以主題式教導。《龍文鞭影》的翰墨佳章，透過學童口誦心維之際，配合孩童喜好「聽故事」的天性，使學童能在潛移默化之中，達到文化典範的傳衍、應世智能的傳習及俗諺典故的傳承等故事啟蒙功能。

四、結語

自西學東漸、民國五四以來。白話文體漸居時代主流地位，對於傳統用典抱持著激烈的反對態度；甚者，更將傳統經典視為八股餘孽，是阻礙社會進步的絆腳石。兒童啟蒙讀物不再是「人之初，性本善」，也不是「關關雎鳩」，更非「學而時習之」等等傳統章句；取而代之者，是格林童話的「白雪公主」或「灰姑娘」、是安徒生童話的「小美人魚」或「醜小鴨」等等翻譯童話。此等的現象所造成的影響，即是兒童人格在啟蒙發展階段，便遠離傳統語文教育的文化薰陶。

就如亦耕所言：「古代童蒙教育說穿了只是背誦而已；諷而誦之，隨著心智的不斷發展，蔚成一片知識與義理交融的大海；於是涵而詠之，人格就在此中成長。古人的背誦，實不只是背誦而已，諷誦的本身即是一種涵詠，於是乎，語文訓練、藝術修養、人格陶冶三者合而為一，這是我國傳統語文教育的最大特色。」

38

《龍文鞭影》全書內容包含大量的歷史故事，不僅有「成語故事」的童書特色，其編輯方式更有適合學童記誦的優點。兒童閱讀經典教育強調兒童心智發展重點在於「記憶力」，而不在「理解力」。所以，應該趁

³⁸ 亦耕撰〈諷誦涵詠與語文教育〉：《中央日報》，台北：中央日報社(股)公司（1981.02.10）12版。

適時利用其記憶力強時，記下文化中的精華作品；同時訓練記憶能力，不必勉強要求理解。當兒童漸漸長大之後，閱讀能力增強之時，對所記憶中的文句便可漸漸領悟，觸類旁通。

雖然，對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孝經》、《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等等的記誦，確有一定的功效產生。但是，對於《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或《莊子》等富涵故事或寓言的作品而言，僅僅止於記誦，而不講述故事寓言；不僅有空入寶山之憾，亦有埋沒作者的創作用心；而且忽略兒童愛聽故事的天性，更忽視兒童先天認知的潛能，實屬可惜。就如江應龍對傳統啟蒙教材所評：

「第一、在學生記憶力最強的兒童時代，灌輸給他們許多有價值的讀物，使他終身難忘。第二、所選教材，著重日常生活之應用。第三、教材多用短句韻語，便於誦讀，便於記憶。第四、一般民眾讀誦，多用韻語以述故事，易讀而有趣味。總之多採用代表我國文化精神的基本古典讀物，是它的最大優點，總比完全移植西洋的童話故事和一些沒有意義的話好得多。」³⁹

《龍文鞭影》今在坊間已不見蹤影，僅散見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國立台中圖書館、台中市圖書館烏日分館等）或學校（東海大學）所收藏、或為私人所珍藏，取得不易。而且館藏版本均為影印，字體不易閱讀，更缺書序，研究困難（然拜網路科技之賜，已能方便快速閱讀，但註解工作尚未完成。）。雖不致「五厄」之嘆，但確有「斯道」不傳之傷。然而「適者生存」有以致之，一者，成也「韻」、敗也「韻」，由於科舉制度的廢止，加上注音符號的推行，使得本書重要性喪失。再者，以類書檢索觀點，有以類、字、韻繫事的分別⁴⁰，由於本書人物眾多，當閱讀者失去串聯方法，便顯得內容龐雜無章，不易有效查閱；以認知觀點，也較難思維運作。三者，對於典故高度的濃縮，除非是通俗常用的故事，否則造成講解不易，用途不廣，因此無法推展；對書商而言，則無利可圖，故有以致今日。

蒙書在外形的文字表達是淺顯易懂，是由於蒙書的教授對象是學童；然而，蒙書的內在體例型式的創作行為，也是一種文學表現的方式。所以，蒙書的文學創作表現中，作者皆欲求在所傳承的作品中，建構蒙學的價值體系，建立不朽的「立言」功業。此種偉大的追求極致象徵行為，可在南北朝周興嗣、唐代李翰、北宋王應麟、南宋劉克莊或謝枋得、元朝郭居敬等人的著作發現，是一種無所不在感染力量。然而，時至

³⁹ 江應龍撰《且說私塾》：《國文天地》6卷4期，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68）頁43—44。

⁴⁰ 正宗類書的編排體例有三：一者以韻隸事，如《運海鏡源》（唐，顏真卿）、《韻府群玉》（宋，陰實）、《永樂大典》（明，解縉、姚廣孝）、《佩文韻府》（清，張玉書）等；再者以類繫事，如三通（唐杜佑之《通典》、宋鄭樵之《通志》及元馬端臨之《文獻通考》）、《藝文類聚》（唐，歐陽詢）、《冊府元龜》（宋，王欽若、楊億）等；三者以字繫事，如《駢字類編》（清聖祖敕撰）、《淵鑑類函》（清，張英）等。

今日，它們的感染力量似乎消退，甚至不見了。《龍文鞭影》處於現代的環境，也必須有所改變（編）以因應，以符合潮流所趨；更藉由本文的拋磚引玉，期待有識之士讓《龍文鞭影》再現風華。

五、徵引文獻

（一）典籍部分

班固〔漢〕(1984)。《漢書》。臺北：宏業書局有限公司。

朱熹〔宋〕(1970)。《朱子大全》。臺北：中華書局。

陳振孫〔宋〕(1979)。《直齋書錄解題》。台北：廣文書局。

程允升〔明〕、黃錫山箋註、葉玉麟譯解(1975)。《幼學白話句解》。台北：五洲出版社。

程登吉撰、馬自毅注譯(1997)。《新譯幼學瓊林》。台北：三民書局。

過庭訓纂集(1992)。《明分省人物考》。臺北：明文書局。

章學誠〔清〕(1987)。《文史通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連橫(1995)。《台灣通史》。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

（二）專書部分

蕭良有纂輯、楊臣諍增訂、來集之音註(1978)。《龍文鞭影》。台南：綜合出版社。

蕭良有纂輯、李祚唐校點(1990)。《龍文鞭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蕭良有纂輯、林邦鈞新注(1992)。《龍文鞭影新注》。北京：師範大學。

蕭良有纂輯、楊立武譯評(1993)。《龍文鞭影譯評》。成都：巴蜀書社。

（三）專著部分

王邦雄等(2011)。《中國哲學史》(下)。臺北：里仁書局。

王重民(1978)。《敦煌古籍敘錄》。台北：成文書局。

方師鐸(1971)。《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台中：台中私立東海大學。

亦 耘(1981)。〈諷誦涵詠與語文教育〉。台北：中央日報社(股)公司。

林美惠

余嘉錫（1976）。《余嘉錫論學雜著》。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李維譯、列夫·謝苗諾維奇·維果茨基著（2000）。《思維與語言》。台北：昭明出版社。

林文寶（1997）。《歷代啟蒙教材初探》。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東方孝義〔日〕（1998）。《台灣習俗》。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張德明（1995）。《語言風格學》。台北：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彭聃齡、張必隱（2000）。《認知心理學》。台北：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雷僑雲（1998）。《中國兒童文學研究》。台北：台灣學生出版社。

董志新（1989）。《典故的運用》。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

鄧嗣禹（1970）。《中國類書目錄初稿》。台北：古亭書局。

譚正璧（1978）。《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蘇尚耀（1976）。《中國文字學叢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四）期刊論文

江應龍（1968）。〈且說私塾〉。台北：《國文天地》六卷四期。

張清榮（1988）。〈《龍文鞭影》之兒童文學價值探析〉。台南：《國立台南師院學報》第二十一期。

蔡麗璧等（1990）。〈《龍文鞭影》初探〉。台南：《語文教育通訊》第二十期。

蔡妙真（2006）。〈永恆的經書與流動的價值－唐詩用《左傳》典故之觀察〉。台中：《興大中文學報》第十九期。

蘇美珠（2004）。《厚積薄發騁神思－龍文鞭影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碩士論文）。